

潘啸龙 注评

楚辞



古典文学导读丛书



黄山书社

楚辞

○ 古典文学导读丛书

潘啸龙 注评

黄山书社

楚辞

责任编辑:宋启发

封面设计:丁 明

古典文学导读丛书

楚辞/潘啸龙 注评

——安徽:黄山书社 1998.3

ISBN 7-80630-038-4/I·32

I. 楚… II. 潘… III. 文学

*

黄山书社 出版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6.5印张 157千字

1997年4月合肥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7001-19000册

定价:7.80元

ISBN 7-80630-038-4/I·32

• 因印装质量问题,妨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总 序

严云受

当人们走进书店时，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一片琳琅满目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世界。名著校注，作品鉴赏，古文今译，等等，丰富多样。同一种优秀作品，往往同时有两、三种普及本并存，争奇斗胜。许多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为了把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介绍给广大群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黄山书社组织作者撰写的这套“古典文学导读丛书”，正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一个新成果。面对已经问世、各有特色的众多古典诗文选注本、赏析集，作者与编辑反复思考、商讨，确定这套小丛书要在“导读”上下功夫，见特色。“导”者，引导之意。编者为正文所撰写的注释和导读，都只是为了帮助读者扫除阅读和理解中的障碍，引导欣赏主体进入诗文的艺术世界，积极、自主地赏玩、遨游。

由于时代条件、社会生活及语言文字等多种原因，一般读者阅读古典诗文时，常常会感到很困难。需要借助于注释和分析，才有可能把握语言符合的含义，领会诗文的意蕴。因此，为古典诗文作注释、加分析，是使它走向广大现代读者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好

的注释和分析，不仅首先要求准确、贴合原作文本，而且还必须有助于启发读者的积极的活跃的艺术思维，激发读者在诗文艺术世界寻幽探胜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好的注释、分析，应当解释功能与引导功能兼备。否则，读者虽能理解语言符号的词语意义，却难以对丰富、幽深的诗文艺术天地作深入的、多层面的发掘，难以激活诗文欣赏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难以充分体验艺术欣赏中的审美乐趣。因为，读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是文学欣赏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方面。一部或一篇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审美价值的实现，只有在阅读、欣赏过程中，依靠读者的理解、领悟、参与、创造，才能达到。对于这一点，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曾有过深刻、精辟的说明。我国古典诗学在论述诗歌阅读、欣赏时，也非常强调读者的主动性。一部或一篇作品的语言符号是已经定型的系列构造，它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转移而变动。可是，当它进入阅读过程时，却可能因读者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艺术爱好以及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解读与评价。当然，正确的阅读不能离开作品文本的语言符号的指示意义而胡思乱想，然而，在尊重诗文作品本来含义的前提下，读者却可以主动的、积极地参与、创造，用自己的生活体会、人生感悟去充实、丰富作品的艺术世界；这样，不同读者对同一部（篇）作品的理解、领悟，常常是相通性与相异性共存。阅读、欣赏时如果偏离语言符号的指引，那显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个人独特的发现、体会与领悟，那么，这种阅读只能是停留在较低的层面，无法向高

处升华。对于这一点，我国古代诗论家早有明确的指点，欧阳修很喜爱梅圣俞的诗，但他最喜爱的诗句，并不与作者“最得意处”相一致。梅圣俞吟诵的佳句，又不是他所赏爱的段落。因此，他指出，诗歌欣赏中“得者各以其意”。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沈德潜说得更具体一些：“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古人之言，包含无尽，乐人读之，随其性情深浅高下，各有会心。”可以说，在诗文的阅读、欣赏中，能不能做到“自得”，是阅读是不是有收获的一个重要标志。既然如此，古典诗文的注释、评析，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为读者的“自得”提供帮助。任何一种注析，都只是编写者对文本的一种解读，它不能也不应当代替或妨碍读者的“自得”。如果编撰者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体验，作为一种标准，要求读者以它为规范，那是违背诗文欣赏规律的。

本着这种认识，黄山书社这套丛书的编撰者力求在“导”字上用心思。注释简明，除必要的难点说明外，不作详细的考证；导读只揭示作品的突出特色，略作疏解，留下广阔的艺术空间，让读者的理解力、想像力得以尽情地自由驰骋。这样，导读的文字少一些，但读者的主动性却会更强一些。“自得”也会更多一些。编撰者这种意图，相信一定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与支持。这套“古典文学导读丛书”一定会成为广大读者的益友，帮助他们在诗文艺术天地中，尽情地获得审美乐趣。同是，也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从而使它逐步完善。

前 言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早期，先后耸峙着两座高峰：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诗经”居北，古朴苍茫，俯瞰着一泻奔腾的九曲黄河；“楚辞”居南，瑰丽雄肆，拔出于流贯南国的万里长江。“诗经”、“楚辞”，实际上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其所孕育和影响着的，也不只是独标一帜的中国古诗艺术，而是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及其风貌。

“楚辞”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继《诗经》的集体歌唱之后，在南方楚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体诗歌，它的创立者和继承者，便是以个人独立的创作，开辟了诗歌发展新纪元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因为这种新体诗歌的杰出代表作，乃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二是指汉人刘向所编辑的以屈、宋辞作为主，兼及汉初拟骚之作的诗歌集，集子之名即为《楚辞》。

作为一种诗体形式，“楚辞”的滥觞大抵可追溯到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如《尸子》记载传为虞舜所作的《南风歌》，《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以及《吕氏春秋》所记禹之妻涂山氏女《候人歌》等，即均有“托体兮猗”的特点。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亦有不少诗章接近此体，如《召南·摽有梅》、《郑风·野有蔓草》、《魏风·伐檀》等。至于南方传唱的骚体民歌，如《沧浪歌》、《越人歌》等，其出现亦在屈原以前。但是，这种诗体倘若不被伟大诗人屈原所采用和改造，并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作中，放射万丈光芒，就不可能以其独特的形式拔耸于“诗三百篇”之外，成为“一

代文学”之代表而雄步诗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屈原视为“楚辞”的开山之祖，是理所当然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中，称屈宋之辞而冠之以“楚”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倘若单从诗体形式看，屈原创立的“楚辞”，主要在于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长句句式，并保留了咏唱中的叹声词“兮”。这就使“楚辞”的句式，于参差中见整饬，既富于“长以取妍”的声情，又扩展了它的涵容量。“楚辞”的体制，也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而发展为“有节无章”、波澜壮阔的长篇巨制。这就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抒泻在较大时空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楚辞”与音乐仍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所以在辞中时有“倡曰”、“少歌”、“重曰”的更弦发唱，结尾大多有“众音毕会”、“交错纷乱”的合奏所伴和的“乱曰”。

不过，倘若只将这些形式上的因素视为“楚辞”的特点，还未免是皮相之见。“楚辞”之所以称“楚”，最重要的乃在于它的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楚辞”作家生活于江流清碧、翠嶂插天、“气象常并吴越”的南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楚民族的发展较之于中原民族，还处在相对落后的状况。这里原始的“巫风”尚未消歇，神怪思想还相当浓重；楚人的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诗礼”文化的约束，而更多倾向于“情感型”的躁急、偏执和犷放不羁。同时，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才赢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故其宗土观念、民族自尊意识也特别强烈。另一方面，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的理性精神，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撞击和融合中，又强有力地影响和冲击着南方，并在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批富于革新精神和开拓勇气的志士仁人。而屈原，就正是在深厚肥沃的楚文化孕育下成长，并受到中原理性精

神洗礼，而巍然屹立的贤哲兼伟大诗人。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屈原的创作，并使他所创作的“楚辞”，带有了既与中原文化灵犀相通的精神气质，又在声情、风调、审美取向和思致等诸方面迥然有异的南方特色。“楚辞”多“书楚语，作楚声”，具有北方人所不易诵唱的“清切”音韵，此其一。“楚辞”的表现色彩，受到江南山水的濡染和“巫风”对色彩的神秘观念影响，而带有瑰奇、富艳的特征，此其二。由于神怪观念的流行和巫风那“神游天地”的习俗影响，“楚辞”的构思往往“上薄旻天，下极黄壤。山川磅礴，巫鬼绣错。鞭电驾螭，阴阳百出”（清人杨金声语），带有“凿空不经人道”的浪漫奇思。故鲁迅总结其特点为“其思甚幻”（《汉文学史纲要》），此其三。“楚辞”的作者，无论是屈原还是宋玉，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贤人志士，但又处在朝政昏乱、国家危亡关头，或遭放逐、或遭压抑，这又使“楚辞”的情感表现，几乎都带有深切的“忧患”感，及强烈的不平 and 愤懑之情。“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裴度《寄李翱书》）。其审美取向，大多不同于《诗经》的“温柔敦厚”和儒家的“中和”、婉曲，而表现为狂放、激烈和悲亢，此其四。可见，“楚辞”虽然是一种新的诗体，但总结其特点，则必须联系它的实际作品，对上述四点作综合考察，方能抓住它所区别于《诗经》的独特风貌。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形式上的特点外，恰恰是在表现色彩、浪漫奇思和忧愤、狂放诸特征。这些特征均与独特的楚文化背景和楚国的特定时代相联系，与屈、宋的遭际和情怀相交织，而同时呈现的。失去了这种联系，也就没有了“楚辞”。这也正可解释，为什么“楚辞”的传播始于汉代，而其衰落也恰恰是在汉代。

至于“楚辞”的精神气质，则与它的创立者屈原一样，虽仍带有楚人特点，却又远远超越了楚巫文化的相对原始性，澎湃着中原的理性和民主精神。《离骚》所表现的对历史兴亡的理性思考，对从

卑微者中不拘一格“举贤授能”的大胆主张；《天问》对四方神怪异说的追根问底，对“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怀疑和抨击；以及《九章》所表现的注重法治，和对“国富强以法立”美政的追求，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楚辞”所体现的理想，表面看来，似乎总与对古代圣王贤佐的颂扬和怀念联系在一起，似乎带有相当的“复古”色彩。但其中所贯彻的，却并非是对旧传统、旧制度的固守或维护，而恰恰是一种改革求变、愤怒冲决旧传统的历史进步要求。这只要看屈原对帝尧任用伯鲧治水，所提出的“何不课而行之”的责问；以及《惜往日》对楚王“背法度而心治”的批判；特别是《离骚》等一系列诗作，对旧贵族党人阻挠变革、“非俊疑杰”，顽固追求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禄的激烈抨击，都能感受到屈原站在潮流前头，推动历史进步的鲜明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占优势的是不知革新图强的旧贵族势力。所以屈原诗作中，又表现出当时改革家所共有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切苦闷和孤独感。现在有些研究者，因为楚文化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对原始性，又因为屈原至死眷恋他的祖国，而不愿效战国策士的朝楚暮秦，便论定屈原依恋的是落后的文化传统，是站在历史变革对面为楚文化唱“挽歌”，他的得到崇敬完全是道德、人格的感人，而非精神、理想的进步。这样的论断，尽管自以为突破了“政治性”的分析局限，注意了广阔的文化背景考察，其实却只是一种浮面的形相论断，并不符合事实。如果我们懂得“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原理（列宁语）；懂得在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中，南楚也迎来了理性觉醒的光辉日出；同时结合屈原作品，仔细辨别屈原继承的是楚文化中哪些传统，又在什么意义上突破了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与中原的时代先驱站到了一起。那么，其结论应该正好相反：屈原之所以得到崇敬，恰在于他的理想之进步和斗争精神之伟大；唯其如此，与之相联系着的道德、人格，才能给人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之美，而为后世无数志士仁人钦佩和赞扬。

“楚辞”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屈原作品中所体现的伟大“屈原精神”。屈原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理想精神，那“宁正言不讳以危身”、“虽体解吾犹未变”的孤身抗恶精神，以及“伏清白以死直”的峻洁人格，和眷恋故国、以身相殉的伟大爱国精神，两千年来始终感动着千百万人民，激励着无数志士奋斗前行。“屈原精神”实际上已融入我们的民族传统，并与近世的“鲁迅精神”先后辉映，而汇成了我们永远值得骄傲的“民族魂”。

“楚辞”的艺术成就也是光芒万丈的。屈原、宋玉以其独创性的诗作，在中国古诗抒情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开拓和创造。那超越时空的神奇想象，那铺张扬厉的宏伟体制，那瑰丽缤纷的辞采和狂放悲亢的风格，在“诗三百篇”之外，又开出了一片全新的艺术天地。它直接孕育和推动了“一代文学”汉赋的诞生、发展，并对魏晋、六朝、唐代诗歌的繁荣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无论是“建安之杰”曹植，还是六朝文学集大成者庾信，或是唐诗中拔耸而立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陆游，以至近代的诗界巨擘龚自珍、黄遵宪，现代的诗歌“女神”郭沫若、闻一多，没有一个不受到过“楚辞”的滋养和屈宋的沾溉。

所以，无论从精神还是诗歌艺术发展看，“楚辞”和屈原，都带有笼罩历史的深远影响。不诵读“楚辞”，不了解屈原的精神和诗歌创造，就不能完整理解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渊源和文化风貌。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在创造和开拓当代文化中，继承它、发展它。

这本“楚辞导读”正文，采用的是汲古阁刊本洪兴祖《楚辞补注》。所选篇目自屈原《离骚》至严忌《哀时命》，删略了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三篇，增附了贾谊《吊屈原赋》，

排列次序按原本不变。作品文字大体按刊本原文收录，只在少数地方采用校勘所附异文，以使文义更加通畅易明。在作品“解题”和“注释”中，不少地方融入了我个人研究“楚辞”的心得，作了一些新的解说；而更多地方则采用了王逸、洪兴祖以及现代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简明起见，恕不一一指明出处。“导读”部分文字，则力求从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特色诸方面，作出简明扼要的分析或概括，有时也顺带涉及自己诵读中的感受和兴会。我不希望将“导读”写成太过浅显的层次分析，或索然无味的刻板介绍；而希望它们成为蕴含笔者感情、体会，并能给读者以某种启迪的随感文字。因而在写法上也不拘一格，不平均使用力量。倘若这一尝试能给读者多少有些帮助，我就感到非常宽慰了。倘若不太成功，敬请读者给予批评和匡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于含蕴丰富而又疑义迭出的“楚辞”，我们正可以在共同的欣赏和论析中，不断纠正可能的误解，徜徉在它的奇妙境界和思致中，以加深领略古贤的伟大志趣和情怀。

潘啸龙

1995年11月于安徽师大

目 次

总 序	严云受
前 言	(1)
屈 原	
离 骚	(1)
九 歌	(18)
东皇太一	(19)
云中君	(20)
湘 君	(21)
湘夫人	(24)
大司命	(26)
少司命	(27)
东 君	(29)
河 伯	(31)
山 鬼	(33)
国 殇	(35)
礼 魂	(37)
天 问	(39)
九 章	(57)
惜 诵	(58)
涉 江	(63)
哀 郢	(66)

抽 思	(70)
怀 沙	(74)
思美人	(78)
惜往日	(82)
桔 颂	(86)
悲回风	(88)
远 游	(94)
卜 居	(104)
渔 父	(108)
宋 玉	
九 辩	(111)
招 魂	(126)
景 差	
大 招	(140)
汉无名氏	
惜 誓	(151)
[附] 贾 谊	
吊屈原赋	(156)
淮南小山	
招隐士	(161)
东方朔	
七 谏	(164)
初 放	(164)
沈 江	(166)
怨 世	(169)
怨 思	(172)
自 悲	(173)

哀命 (176)

谬谏 (178)

严忌

哀时命 (184)

屈 原

屈原（约前 342~282）名平，字原。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诗经》之后新诗体“楚辞”的创立者。战国楚人，原籍秭归（今属湖北），生于楚郢（今湖北江陵）。20 余岁即以“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得到楚怀王重用，任为“左徒”，参与改革朝政、革拟宪令、应对诸侯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务。因力主变法、联齐抗秦，触犯朝中权贵，遭上官大夫进谗而被楚怀王疏黜，降为三闾大夫。在此期间，除悉心从事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热忱为朝廷培植贤才外，还曾于楚连遭汉中、蓝田战役惨败的危亡之秋，受命出使齐国，为重建楚齐联盟、解除强秦入侵之危，作出了重要贡献。怀王三十年（前 299），秦昭王于攻城掠地之际故作姿态，约请怀王入秦武关“好会”，实欲挟持怀王签订割地和约。屈原拼死谏阻怀王赴会，与王子子兰等朝中权贵发生激烈冲突，终于触怒怀王，被放逐汉北。怀王入秦被拘，三年后客死于秦。屈原愤怒指斥子兰（当时已任继立的顷襄王国相）的误国行径，子兰恼羞成怒，因借手上官大夫再次诽谤屈原。顷襄王大怒，又将屈原从汉北迁逐到更加僻远的沅湘、汨罗一带。在长达十多年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坚贞不屈，写下了《天问》、《离骚》、《九歌》、《九章》等一系列诗作，抨击贵族党人迫害贤良的罪行，揭露“腥臊并御”、黑白颠倒的腐朽朝政，表达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志。楚襄王十六七年（前 283~前 282），当秦国摧垮楚之盟邦齐国，楚又面临灭国之危，而楚襄王君臣依然醉生梦死之际，屈原痛惜于理想之破灭，决心以结束生命来表达他对腐朽王朝的抗议和与祖国生死与共的情愫。终于

在农历五月端午，怀抱沙石，自沉于放逐之地的汨罗江（在今湖南）中，享年约60岁。

离 骚

题解：《离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约作于屈原放逐江南汨罗期间，时当楚襄王八、九年间（前291～前290）。《离骚》的题义，“离”为离别，“骚”为忧愤。当是诗人于再次放逐，在报国无门、痛苦无诉之际，写下的一首回顾平生奋斗历程的自传性诗作；一首倾诉着少年的憧憬，青年的参与艰难改革，和壮盛之年即遭迫害、放逐的抒愤之作。《离骚》的情感内涵极为丰富：包容了充满希冀的理想追求及其破灭，遭受冤屈和不能容忍暗君、谗臣误国的怨愤，终于只能埋葬“美政”理想的绝望和绝望也摧折不了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孤傲与自信，以及对故国故土万死不变的眷恋深情。多种情感的交织，造出了一种既呜咽悲怆、激烈狂放，同时又坦然从容的浑茫气象。《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出入古今，翱翔云雾，恍惚杳茫，变化无端”（明人赵南星《离骚经订注》）。被刘勰称之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奇文”，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开拓和创造。“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